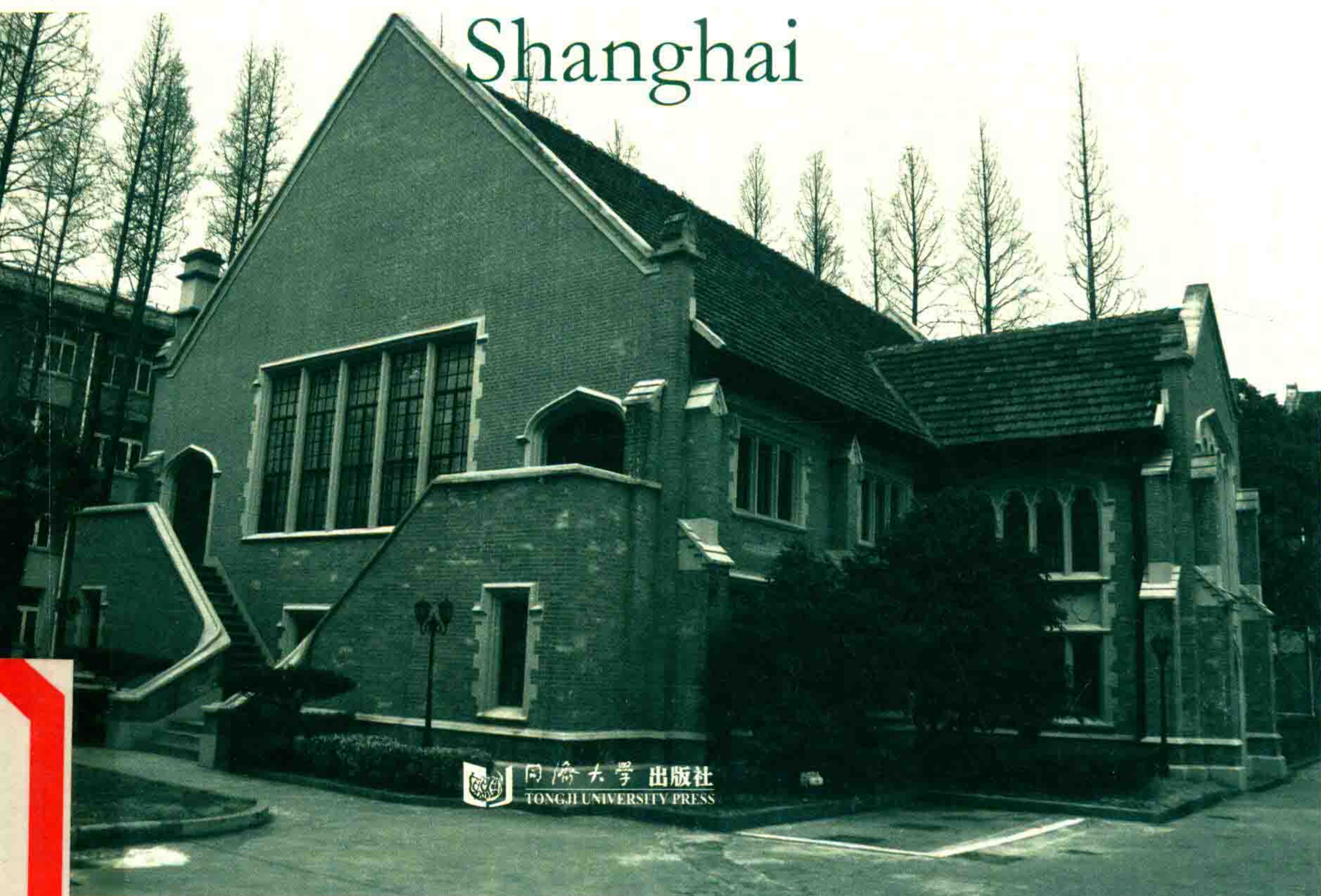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编著 陶祎珺 姜承浩

走近上海高校 老建筑

Old Building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Shanghai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编著 陶玮珺 娄承浩

走近上海高校 老建筑

Old Building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Shanghai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策划 那泽民 乔士敏

统筹 娄承浩 陶祎珺

现今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到处都在有规模地开发、建设，红红火火地实现着“旧貌换新颜”。然而，在一片新气象中，我们也经常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人们变得越来越“怀旧”，也即越来越向往和钟情于旧时岁月里的东西了，同时，那后面的历史文化及其遗产从上到下开始被高度重视，并且，社会同样为之作出了有规模的行动。

如在物质文化领域，大多数城市只要有可能，都在市内设定了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以个性化的特色展现出自己城市的历史风采；更有甚者，不少古城重新砌筑起城墙，修复了高大的城楼、城门，以显古城的厚重旧貌；许多古镇均精心打造，恢复以往的各种旧元素，从而成了旅游者趋之若鹜的地方；远在穷乡僻壤的古村落，也一个一个地被开掘、整理出来，参观者接踵而至，竟顿时出名；而在许多城市里，有古街的恢复重建之，没有古街的，会硬生生地打造布置出一条“历史老街”，同样填入各种老的元素，从而成了这个城市非常特别的一道新风景线。至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从2006年开始，我国开始从下到上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于是包括民俗、民间传统文艺、民间传统技艺、民间传统游艺等，被广泛地挖掘、提炼与利用起来。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可以表演和演示的，它们现今已广泛充实到和活跃在我们每年的传统节日和群众文化活动中，以非常别致亮眼的节目，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闪耀出了奇光异彩。

人们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怀旧情结，历史文化及其遗产到今天能冲破现代化、国际化的重围，受到当代大众广泛的尊重和青睐，我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中国毕竟是文明古国，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悠久历史中一路行进过来，民族之魂永在，文化之根根深蒂固，这是极难动摇的；第二，在现代化、国际化的环境中，国家和地方的性格必然也被提到极大的高度，民族个性、地域特色于是被充分地肯定和阐扬，历史文化正好是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中最核心最有代表性的内容；第三，我国各个时代的文字记载，以及口耳相传的文化情节，丰厚无边，留下了无限广大和精彩的记录和口述，这足以使我们的文化记忆不会磨灭；第四，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旅游事业大发展，旅游需要文化，必然推进到历史文化，于是，借着旅游事业的春风，历史文化景点及项目的开发与兴旺就可谓如火如荼了。

也就在上述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济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这套《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来，为我们上海文化遗产事业的传承和弘扬来增光添彩。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由以娄承浩先生为首的一批建筑史专家承担，以上海的重要历史建筑（既有尚在的，也包括已消失的）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专业性的系列。

关于建筑，我一直认为是我们每天目所必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伴侣，而它们又正是每个城市里非常有历史底蕴，有人文内涵，同时以其形形色色的造型、装饰等，生成为一个城市宏观和微观的风貌、风情的主要载体。我想，建筑及建筑文化的伟大与令人感到亲切之处也主要就在此吧。而上海更是特别。上海在近代开埠以后，从一个县城跃起而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和世界著名都会。在这一翻天覆地的变迁中，上海海纳百川，开全国的先河，各种各样的新颖事业，如近代的市政建设事业、近代公用事业、近代房地产业、近代教育事业、近代卫生事业、近代科技事业……在此全面地大举兴起。而每一个事业都需要由实体的建筑来承载的，于是巨量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建筑便在这个城市应运而生了。

目前有关上海的建筑图书已出版了不少，但这套丛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近代上海各种新兴事业为分类，一类一书，这样就做到了比较集中、比较专业，如你要了解、研究每一个专门事业的领域的建筑状况，就十分便利了。在写作上，做到了既有建筑的变迁追叙，又有它们的现状交代；既有建筑的结构风格，又有它们的人文故事；既有文字记述，又有大量图照的配合。所以虽然属于建筑方面的书，但称得上是简明清晰、阅读便易、引人入胜的了。这套丛书对唤起和强化我们的城市记忆，必然会起到清新的、独特的功效。

如果提什么希望的话，我但愿这套丛书能继续发动更多的作者，加入其中，以写出更多的专题来。因为大上海历史上形成和延续至今的新兴事业实在太多了，从而相随而起的建筑也是百业百态，丰富多彩，同样多值得我们在今天广泛地回顾和推介。当然，要全面反映和展示它们，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类别。不过，来日方长，可以慢慢地不断延伸，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想这个系列一定就会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强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郑祖安

2016年12月

序 言

第一章 上海高校老建筑因缘 / 001

第一节

洋务运动影响与维新变法推动,
产生上海官督商办高等教育 / 002

第二节

西方文化浸透、中方的渴求,
产生教会大学 / 005

第三节

清末上海新教育时期,
中外绅商联合积极办学 / 008

第四节

建国初期院系大调整,
新建和调整校园建筑 / 011

第二章 上海交通大学 / 014

第一节 中院 / 017

第二节 新中院 / 018

第三节 老图书馆 / 019

第四节 上院 / 021

第五节 体育馆 / 023

第六节 总办公厅 / 024

第七节 工程馆 / 026

第八节 新文治堂 / 027

第九节 执信西斋 / 028

第十节 校门 / 030

第十一节 震旦图书馆 / 031

第三章 上海理工大学 / 033

第一节 校园规划 / 035

第二节 思晏堂 / 036

第三节 思裴堂、思伊堂 / 038

第四节 怀德堂、馥齋堂 / 039

第五节 体育馆、艾德蒙堂 / 041

第六节 图书馆 / 042

第七节 音乐堂 / 044

第八节 大礼堂与思魏堂 / 045

第九节 科学馆 / 046

第十节 麦氏医院 / 047

第十一节 德文医学堂 / 048

第四章 华东政法大学 / 050

第一节 怀施堂 / 052

第二节 格致楼 / 057

第三节 思颜堂 / 058

第四节 霍格别墅 / 060

第五节 思孟堂 / 060

第六节 罗氏图书馆	/ 061
第七节 交谊室	/ 062
第八节 顾斐德体育室	/ 064
第九节 西门堂	/ 066
第十节 新科学馆	/ 068
第十一节 斐蔚堂	/ 069
第十二节 礼拜堂	/ 070
第十三节 树人堂	/ 071
第十四节 纪念牌坊	/ 072

第五章 复旦大学 / 074

第一节 简公堂	/ 076
第二节 奕柱堂	/ 077
第三节 子彬院	/ 079
第四节 相辉堂	/ 080
第五节 老校门、燕园	/ 082
第六节 一号楼	/ 083

第六章 同济大学 / 085

第一节 一·二九礼堂、一·二九楼	/ 088
第二节 文远楼	/ 089
第三节 南、北楼教学楼	/ 091
第四节 西南楼	/ 091
第五节 大礼堂	/ 092

第七章 华东师范大学 / 094

第一节 群贤堂	/ 096
第二节 思群堂	/ 097

第八章 其他院校 / 099

第一节 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楼	/ 099
第二节 上海音乐学院办公楼与专家楼	/ 101
第三节 上海体育学院办公楼	/ 102
第四节 第二军医大学飞机楼	/ 103

附 录

附表一

列入上海市第一~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上海高等院校里的老建筑 / 105

附表二

1930年上海大学、专科学校
名录 / 107

参考文献 / 108

后 记 /

第一章 上海高校老建筑因缘

高等学府常被冠以“象牙塔”之名，意指这里是崇高、圣洁的文化聚集地。21 世纪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一些新兴高校崛起的同时，有着渊远历史的百年老校也在大兴土木。而无论扩建老校区还是新建现代化的崭新校区，那些从民国时期走来的老建筑大部分依然伫立在校园内。这些建筑不仅仅发挥着现实的使用功能，还成为一种大学精神的载体，一种“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精神延续。漫步在建校之初栽植的大树绿荫之下，观瞻这些凝固在岁月时光中的老建筑，是一种远离烦嚣尘世的净化心灵之旅。这些建筑走过了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那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已是嵌入其一砖一瓦内的力量。即便身处闹市区，在这里仍能找回一丝宁静。

而今这些建筑大都列入了优秀历史建筑和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名录，这些承载学校发展的历史建筑对宣传高校品牌、传承历史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紧密相连。上海最早办学始于南宋咸淳年间，由上海人唐时措、唐时拱兄弟俩购下本地一处民宅，修建了“古修堂”，以作“诸生肄习所”，当时上海还未建县，因此称之为镇学。此后随着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植根于封建科举体制土壤下的求学机制不断完善，私塾、书院、社学、义学等等各类办学机构兴盛起来。如明代敬业书院，设在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居宅内，有讲堂、左右书室、后斋等，文史学家陆锡熊、考据学家钱大昕等曾就读于此。洋务运动以后西学渐进，上海新式教育出现。

第一节 洋务运动影响与维新变法推动，产生上海官督商办高等教育

1842年船坚炮利、武器精良的英国舰队进犯吴淞口，上海失守，其后英国舰队又步步紧逼，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上海作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被迫开埠。这一利炮打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可再沉迷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夜郎自大之中，李鸿章曾在《筹议海防折》中提道，西方侵略者“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国人深感落后就要挨打。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感到学习西方的“长技”是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清廷的洋务派官员便以此为基础，在全国首次推行大规模的工业运动，其中重要举措便是引进大量西方科技及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留学童生，打开西学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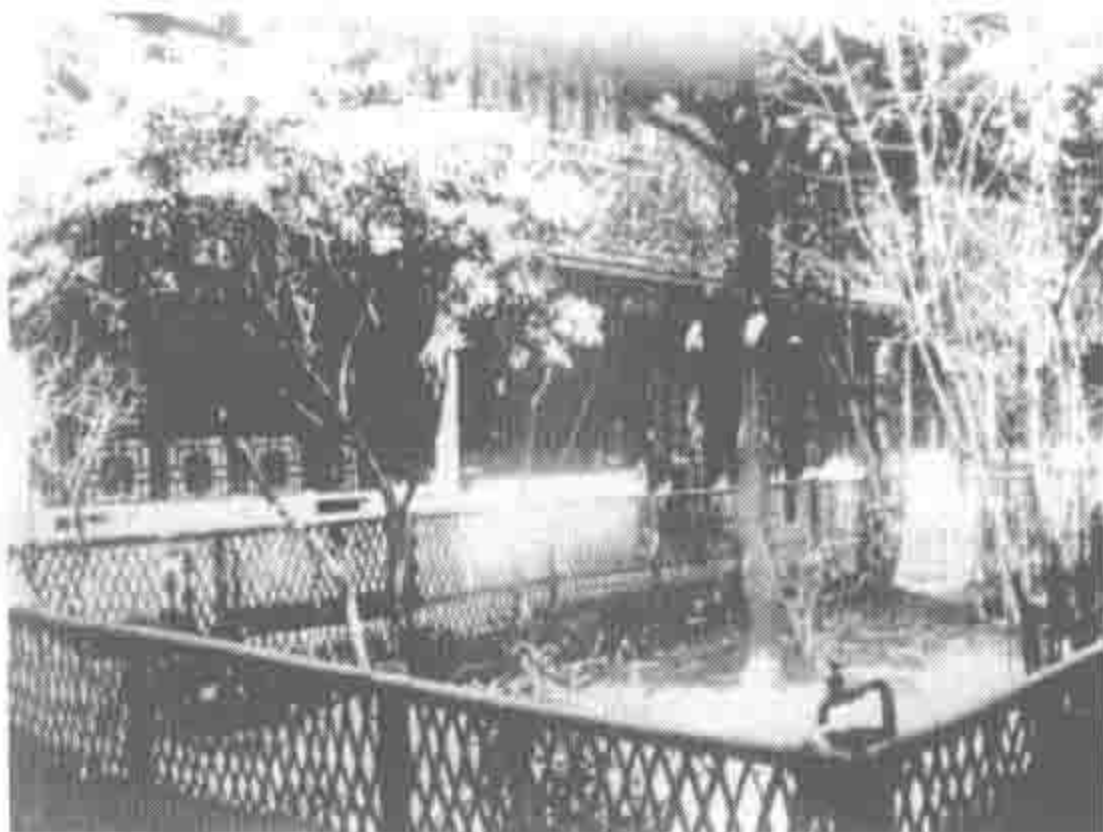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几十所近代新式学校，教授西方诸国语言文字、修理船舰枪炮及机械技术，其教学内容已涉及国内旧式学校没有的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专门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1863年上奏《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他认为上海为洋人汇集之地，中外交涉繁杂，缺少精通外语的外交人材，需设立类似京师同文馆那样包含语言类课程的学校。获准后，创办了上海同文馆，选址旧学宫，即今学院路四牌楼附近，由冯桂芬任馆长，拟定办学章程，并定校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后于1867年改名“上海广方言馆”，



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



李鸿章访欧时留影（前排左三）



上海广方言馆



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1896年盛宣怀给清政府《请设学堂片》的奏折



约翰·卡尔文·福开森

成为中国最早的语言类专科学校之一。

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制造局，课程除算学、代数、几何、天文、地理、绘图及外文等基础课外，还设勘察、地矿、冶铸、制造、航海等技艺课，培养中国外交、教育、工矿制造和海军方面人才。清朝外交官吴宗濂、清著名翻译家钟天纬、中华民国外交官陈贻范、中华民国军事及政治人物唐在礼等都在该校学习过。

洋务运动在1895年的甲午海战战败后落下帷幕，虽以失败告终，但洋务运动带来的现代新式教育（新学）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并在文化交流、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洋务运动后维新变法继续将近代教育的改革、发展推向前进，其代表人物梁启超极力推行“西学”，要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他在《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提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古议院考》中还有他的一句名言：“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因此，在康、梁的积极推动和影响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建立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变法还提倡将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等传统学校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并鼓励私人办学，以及开办一些翻译、医学、农、商、铁路及蚕桑等专业的速成学堂。

上海是维新运动中心之一，社会呼吁提倡西学，培养新兴人材。在兴学、启蒙、救国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南洋公学诞生了。创始人盛宣怀，他曾是李鸿章行营内文案兼营房处



盛宣怀、福开森等合影（前排左二盛宣怀，后排右四福开森）

会办，后来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和汉阳铁厂督办，是李鸿章洋务路线忠实的执行者。他在兴办实业过程中，深感中国科技落后、人才匮乏，认为“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1896年10月，他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并附《请设学堂片》，经费由招商局、电报局提供。同年12月6日光绪皇帝谕令准许。学堂择地徐家汇新建校舍，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正式开学。

南洋公学隶属招商局、电报局，设有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学生均寄宿学校，特聘美国博士福开森为监院。1911年辛亥革命后改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由交通部管辖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堂，1921年唐山工专、北京邮院、交通传习所三校合并，与上海工专一起正式成立交通大学。

维新变法虽然最终仍归于失败，大多新政措施未能实施，但是在高等教育上，从南洋公学创办伊始所设立的学院及专科来看，中国有了自己创办的近代大学，且广泛吸收了西方及日本的教育理念，使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发生巨大变革，极大地超越并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

第二节 西方文化浸透、中方的渴求，产生教会大学

外国教会在上海的传教活动约始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天主教徒松江府上海县人徐光启因父去世由京返乡守制，路过南京拜访了一位意大利神父郭居静，请他来上海开教。神父来沪后，徐光启在自己宅院“九间堂”附近为方便传教盖了两幢简易的教堂，成为当时传播福音的中心。



徐光启画像



意大利神父郭居静

教会来华传教的初衷多少是带有一种侵略性的，尤其在上海开埠以后，帝国主义不但是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利用金融、航运、进出口贸易把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时文化渗透作为对被侵略者从思想上的洗礼与教化也在积极进行之中。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各项特权与庇护，大肆宣扬教会理念。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办报、办学、办医院等传输教旨理念，将西方文明中积极的一面引入中国，推进教会事业，培植其在华根基。不得不承认这些举措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办报开了中国近代报业之肇端，由美国传教士伍德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办医院做慈善，引入西方先进的医疗服务，创办了如公济医院、广慈医院、圣心医院等一批悬壶济世的医疗机构，这些医院随着历史的更迭成为今天沪上那些著名三甲医院的历史根基。

办学，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传教士们认为这种方式更容易让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人民从内心中接受他们。从办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教育从孩童抓起，达到驯服可靠，忠诚不变，真正接受教的理念。因此在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大都提到办学的一些特权。如《中英上海租地章程》中规定：洋商租地后“得修建教堂、医院、慈善机关、学校及会堂”。《中美华盛顿续约》强调：“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虽然教会办学初衷为传教，课程设置上神学课程等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与此同时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后来事实证明，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京条约》开放五处通商口岸，上海居其一，而不得不承认

上海居东南各省水陆交通的枢纽，又处长江水道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使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近代文明空前发达。19世纪末期中日甲午海战后，英国专栏作家干德利（R.S.Gundry）在《中国的今昔》一书中这样描述：“上海的工部局是最好的传教士……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由帝国他处去过上海，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建筑，整洁的街道，燃着电灯或瓦斯灯，他们可以看到机器、自来水、电报、电话、火轮船、公园。他们在这里所得到的印象，必将多少传到内地区。”

随着上海近代工业文明的广泛传播，民间“崇洋”风气日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教会的活动也受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加之如维新派人士康、梁来到上海，无需踏出国门便亲身感受了这里近乎原汁原味的西方文明，坚定了向西方学习和变法图强的信念。在这种里应外合之下，为教会办学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天主教、基督教纷纷在上海开办小、中、大学，其中高等教育的学府在如今的诸多高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教学场所仍保留至今。

当时天主教在上海创办的高等教育是震旦学院，1902年由天主教耶稣会司铎马相伯主持创建。马相伯的父母均信奉天主教，因此还在襁褓中的他就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12岁



震旦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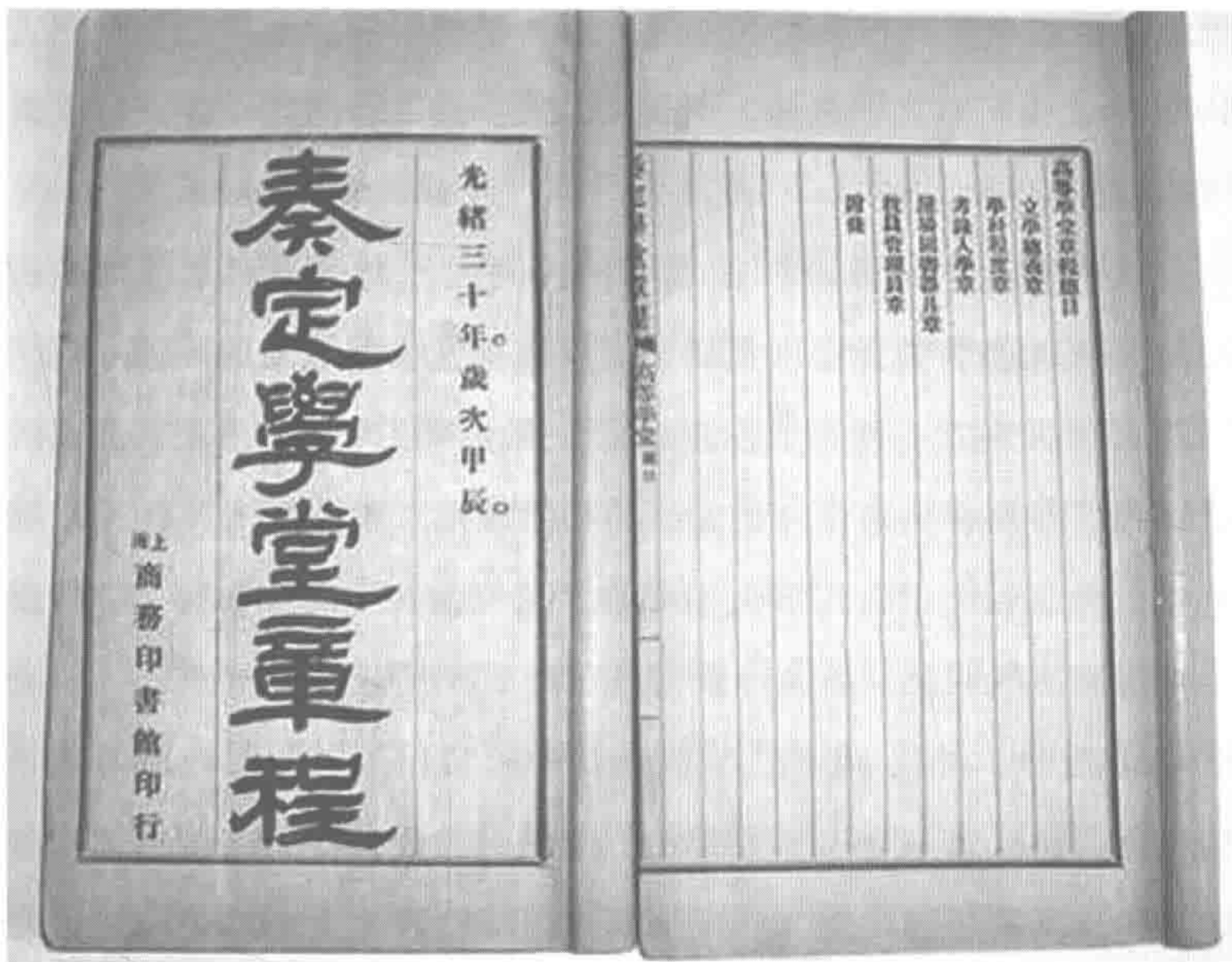
震旦大学全景



圣约翰大学校徽



爱国老人马相伯



《奏定学堂章程》

时入学法国耶稣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改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1862年到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攻读拉丁文、法文、希腊文，研究神学、哲学和数学，1870年获神学博士。马相伯是上海教会大学最早的推手，他始终有创办新式大学以救国的梦想，1900年变卖祖产，将松江、青浦的3000亩农田捐给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所用，但终未如愿。

马相伯住在徐家汇土山湾一带，他是当时少有的宣贯中西的人才，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都曾来向他求学。其中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每日清晨五点来马相伯寓所学习拉丁文，他同时还挑选了学校“特班”中24名学生一同去学习，筹组译社。这24名学生中后来大都成为了一代大家，如日后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弘一法师李叔同、数学教育家胡敦复等。逐渐慕名来马相伯寓所求教的人越来越多，马相伯再度与教会交涉希望完成当年捐献所愿，终于在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取名“震旦”意寓中国之曙光，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学校选址法租界卢家湾一带，因其倾产建校，法国天主教承认他是学校创始人，奉为董事长，但不让他过问校务。1932年在教育部立案，定名震旦大学，设文、法、

理工、医四个学院，后来在法国立案，学校毕业证书中法均认可。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所设文、法、理工、医四个学院分别并入他校。

圣约翰大学是基督教在上海创办的近代高等教育学校，是由1865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培雅书院及次年成立的度恩书院于1879年合并成立，校址选在沪西梵皇渡。1892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为了吸引学生和扩大影响，学校免收入学学生杂费，免费提供住宿和生活用品。美国传教士卜舫济1888年担任学校校长，直到1942年退休，长达54年。学校最初设国文和神学两部，1880年设医学部，1881年设英文部，学校规定用英文授课。20世纪后扩大办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1906年以后毕业生可进美国大学深造。历届毕业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近现代杰出人材，其中有外交家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严家淦；实业家刘鸿生、荣毅仁；新闻家邹韬奋；作家林语堂；建筑家贝聿铭；医学家颜福庆等，还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球队。

沪江大学原是1906年美国基督教南、北浸礼会创办的上海浸会学院，校址选择在沪东黄浦江畔，校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柏高德。后易名为沪江学院。1912年将原设在四川路的初级道学院并入，于1915年正式更名为沪江大学。1917年与美国教育行政机关挂钩，获准可授美国学位。1929年为学校设文、理、商、教四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向中国政府教育部备案。1928年31岁的刘湛恩任校长，他主张沪江大学要更为中国化、本土化，他任校长期间，建图书馆、教学楼、体育室、食堂、大礼堂等，为学校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38年刘湛恩校长拒绝当汪伪教育部长，同年4月7日上班路上被日伪特务暗杀。现在，学校校园内特置刘湛恩铜像纪念座。



沪江大学校徽

第三节 清末上海新教育时期，中外绅商联合积极办学

清末政府面临严重内忧外患之局面，在国门被迫打开的情况下，也从天朝自大中惊醒过来，其中颁布一系列新政改革教育体制，废

止八股文、设学堂；停科举，设学部；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等。然国库力量有限，全面开办新式学堂力不从心，政府又颁布一系列章程鼓励绅商一同参与办学，如1904年清政府颁布《学务纲要》、《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学堂章程》，鼓励商人办学。《学务纲要》提道：“对于绅商在办学或劝学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者，禀请督抚分别给予奖励。”光绪帝在上谕中指出：“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

一方面绅商历来受到政府轻视甚至压制，而清廷此举给不少士绅带来了成就感，似是身份地位得到国家的承认，无论是为功名利禄或是民族危亡，都开始积极地投身办学之中；一方面维新变法，在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如康、梁等对西方新式教育的鼓吹之下，士绅中的有识之士已对发展新式教育、实业救国的理念深谙不讳。另外，在教会办学中，士绅真真正正、切切实实地看到了西方文明给救亡图存带来的曙光，合理的学科设置及专业技术的教授培养，为实业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期由中外绅商联合办学屡见不鲜，出现了大量此类新式学堂。

格致书院是上海第一所由中外绅商共建的，以学习科学技艺为主的新式学堂，开上海中外人士合作办学之先河。1874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与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商议成立格致书院。选择县城北门外附近八仙桥北，由麦华陀和唐廷枢负责向中外绅商募捐经费，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负责征集图书仪器，徐寿负责购地和设计建造书院。书院董事会由徐寿、唐廷枢及王荣和、徐建寅（徐寿之子）与西人麦华陀、伟烈亚力、傅兰雅、福昌行主福弼士等中西人士共8人组成。书院建成后，李鸿章亲题“格致书院”匾额。书院陈列中外商绅捐赠的模型、仪器和书籍，开院当天200多人参观，评价“无有不赞美房屋之华丽与器具之巧妙”。

格致书院办学要提倡科学，不宣传宗教，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座专门研习“格致”之学的教育机构。书院平时大门敞开，任人进出参观，以此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还举办科学讲座。1879年11月，

书院招收学生，开设西国语言文字和格致实学两个专业，格致实学设算学、化学、矿学、机器等专业，学制三年，求学者缴纳 300 元，每年学费 40 元，学院供给伙食。1895 年傅兰雅设计了西学课程，以数学学科为基础，设立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类专业课程。使“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而学生在书院中掌握了“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等科学技术，便能够“有益十时、有用于世”，达到“为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的目的。1884 年，傅兰雅离开上海，格致书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接管，1910 年停办，1913 年改办中学程度的华童公学，定名为工部局格致公学，即今格致中学的前身。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此外，1881 年美国纽约监理公会总布道会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创办中西书院，院址选在八仙桥三一堂以南（今合肥路 11 号）。该书院有着一定的教会背景，但其创办经费大都由上海中外士绅募捐所得，士绅出资出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西书院学制四年，若学有长进，可续读至八年。第一年认字、学写字；第二年学习文法，翻译字句，学习西文；第三年学数学、地理、翻译选编；第四年学代数、物理、应用文；第五年学天文、几何；第六年学化学、力学、微积分、翻译书籍；第七年学航海知识、万国公法；第八年学国策、天文、地理、采矿等，学生修学完毕不仅达到大学毕业水准，而且知识结构很全面。1883 年 2 月，中西书院迁入乍浦路昆山路东北角新校舍，1911 年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海关、邮政、铁路以及实业界人才，大多数都出自该校。

复旦公学是爱国人士马相伯创办，1903 年在卢家湾建震旦学院，1905 年震旦学院发生学潮反对外国传教士干涉校政，马相伯支持学生另立新校。同年在吴淞另择校舍，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两江总督周馥拨银一万两，邀请严复、张謇、熊希龄等国内著名人士为校董，这样民办官助的复旦公学诞生了。命名复旦，寓意“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12 年曾搬迁到徐家汇李鸿章祠堂办校，分预科和本科。1915 年在江湾购地建校舍，1917 年改名复旦大学，因马相伯年事已高，由李登辉任校长。1923 年大学预科留在李公祠，本科搬入江湾新校区。